

“振兴的机遇”与“失去的机会”

冯海桐 秦正阳 计金昊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美国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替代日本的生产网络，将技术转移到亚洲经济体，用新的供应基地替代日本。在这一时期，美国电子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亚洲经济体转移技术。然而，同在亚洲、时段相同、技术来源一样，亚洲经济体利用美国技术转移的成效却差异显著。面对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越南与之失之交臂，在相关技术领域毫无建树；港英时期的香港地区也遭遇严重困境，其电子工业未能升级，技术水平逐步落后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此同时，中国内地把握住了这次机遇。同样面临美国的技术转移，为何对一些亚洲经济体而言，这是一次“振兴的机遇”；对另一些经济体而言，却是“失去的机会”？

文章认为，不同经济体的技术转移成效差异主要源于**两个因素**：技术落后者与技术领先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竞争性或互补性）；技术落后者自身的技术能力。文章通过对日本、越南、港英时期的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的跨案例比较，以及对战后日本不同时期的案例内比较，展示了利益关系和技术水平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当技术落后国家或地区与技术领先国家存在利益互补，并且自身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时，它们才能有效利用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反之，如果缺乏这两个条件，即使面临技术转移的机会，也可能无法抓住，从而错失发展机遇。

但同时需要指出文章论述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是**时效性问题**，文章的分析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情况，但技术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文章的分析框架在当前全球技术转移中的适用性可能存在局限性。其次对于**技术能力的定义不明确**：文章提到技术能力是关键因素之一，但该概念的具体定义模糊，且衡量技术能力的方法多样，这可能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再者，**社会与文化因素未被充分考虑**：文章聚焦于经济和技术因素，但技术转移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这些因素，还可能受到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创新文化、教育水平和社会稳定性等也可能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对此未给予充分考虑。最后，**忽略了间接技术转移**，文章主要强调了直接的技术转移（如美国直接将技术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忽视了间接转移的可能性。实际情况中，技术不仅仅通过发达国家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可能通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如中国向越南转移技术）。技术转移链的存在使得技术转移的途径更加复杂，这一点在文章中并未充分展开。

这篇文章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因为它强调了国际技术转移背后国家利益和竞争的**驱动因素**。现实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主要受到自身利益和安全的驱动，往往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中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在技术转移的情境下，不同经济体的技术吸收能力与其与技术领先国家的利益关系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具有竞争性或互补性，从而影响技术转移的效果。此外，现实主义关注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和**相互制衡**，这在文章中有所体现。例如，美国通过将技术转移到亚洲，实际上是希望借此遏制日本的崛起，并为自己的电子产业寻找新的供应基地。这一权力斗争影响了技术转移的方向和效果。